



外语应用与研究

FOREIGN LANGUAGE APPLICATION & RESEARCH

第二辑



FOREIGN LANGUAGE APPLICATION & RESEARCH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第2辑

FLAR

外语应用与研究

Foreign Language Application & Research

主 编 吴国良

副主编 冯春灿 李敬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语应用与研究.第2辑 / 吴国良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308-08576-2

I. ①外… II. ①吴… III. 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1569 号

外语应用与研究(第2辑)

主编 吴国良

责任编辑 李桂云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7

字 数 212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576-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外语应用与研究》编委会

主 任 杨银千

副 主 任 吴国良

特邀编委 杜学增(北京外国语大学)

连淑能(厦门大学)

方梦之(上海大学)

Bill Dynes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

编 委 杨银千 吴国良 杨纪生

徐左平 杜世卫 单胜江

何建乐 娄华水 章岳龙

朱小农 刘银钟 蒋梓骅

杨德玲 顾雪梁 刘兴家

赵海峰 冯春灿 李敬佑

主 编 吴国良

副 主 编 冯春灿 李敬佑

编 辑 吴 侃 孔 勇

目 录

Contents

• 海外视野 •

牛津剑桥之谜 连淑能 / 001

• 翻译研究 •

从汉英思维对比简析汉译英实践中的三类失误及解决方法 吴 侃 / 0015

• 语言学研究 •

基于语料库的平行结构零冠词用法实证研究:单介词平行结构 冯春灿 / 022

近十年国内外语类语料库实证研究综述(2000—2009) 赵 莹 / 036

• 外语教学研究 •

非智力因素的界定及其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 黄 艳 / 046

英语变体及其在教学上的意义 翟志群 王 景 / 053

如何利用情感过滤理论进行英语教学 冯 超 / 059

教师自主:通向教师发展之路 肖小燕 / 063

• 外国文学研究 •

西方了解中国古诗的一个重要窗口——读 Pound 的《神州集》 陈光勋 / 068

从《啊,拓荒者》到《我的安东妮亚》看薇拉·凯瑟的女性观的嬗变 王清华 / 073

分裂的视角:论《达罗威夫人》和《人到中年》的主题互文性 陈 霞 / 079

Robert Frost 诗歌意象分析 陈文琴 / 084

• 外国文化研究 •

史诗《吉尔伽美什》里文明的隐喻 宋国芳 / 090

• 书刊评论 •

评《新编商务英语翻译教程》(英译汉) 余飞英 / 095

《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八版述评 陈 霞 / 101

牛津剑桥之谜

◎连淑能*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是作者向教育部呈交的牛津和剑桥大学考察报告的一部分。作者着重介绍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优越环境、杰出成就、优良传统及其给我们的启示。本文采用比较教育学的方法,对牛津和剑桥的办学思想、导师制、学院制、招生、考试、教育方法、改革动向、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剖析,揭示其创世界一流的奥秘,并与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现状作了比较,为我国高校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可资借鉴之处。

关键词 牛津;剑桥;优良传统;教育改革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世界一流名校。世界 100 所名牌大学排名尽管年年不同,牛津和剑桥都名列前几名之内。牛津建于 12 世纪,剑桥建于 13 世纪初,哈佛建于 17 世纪,哈佛的创办人又是剑桥的校友,因此在哈佛之前后至少 500 年,牛津和剑桥长期位居世界名校之首。难怪古今中外无数学者对之仰慕,盼望能够探求其奥秘。我有幸应邀到牛津和剑桥进行研究、讲学并对之考察,深感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方面太多了,以下仅介绍三个方面:第一,牛津和剑桥的优越环境;第二,牛津和剑桥的杰出成就;第三,牛津和剑桥的优良传统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一、牛津和剑桥的优越环境

英文 Oxbridge(牛桥)确有此词,因牛津和剑桥大同小异:传统相同,体制相近, Cambridge 又是 Oxford 的延伸,用此词表示其一所或两所大学。

校园

牛津和剑桥都是大学城,城市与大学混为一体。大学没有校门,没有围墙,街道就从校园穿过,这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开放性,不同于中国大学的“大墙文化”。大学不仅校门、围墙开放,而且学术、观念和人才也开放。大学和学院也没有招牌,这反映了英国人言辞低调(Understatement)、含而不露(Reserved)性格。

牛津和剑桥是全球著名的学者研习中心。校园之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可谓全球之冠,多少诗人和作家为之讴歌。其内外魅力,每年都吸引世界各地几百万游客慕名而来。一到旅游

* 连淑能(1942—),男,福建惠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原院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学术顾问,研究方向为英汉语言与中西文化、翻译理论与技巧、跨文化交际学。

旺季,街上车水马龙,旅游专车来回穿梭,步行游团接二连三。然而街市背后的学院,依然沉浸在宁静的氛围之中,听不到街上的喧嚣。学院里,一片片绿茵茵的草坪,与四周中世纪土黄色的石质哥特式建筑楼群构成一座座四方院。大多学院是院中有院,院外有院,院内有园,院连院,院连园,大院套小院。有的学院简直是大公园,有河、湖、花、草,鸟语花香,有的还有鹿园,真是研习的好去处。

牛津和剑桥的总体建筑风格大同小异,从其外层剥落的石质墙体可推测其几百年历史。许多学院附带教堂,大学也有教堂,至今如此。牛津以全市到处都有塔尖而闻名,号称“塔城”。哥特式的塔尖直指苍天,大有攀登科学高峰之气概。剑桥校园似乎更美,更整齐有序,许多学院沿着剑河排列开来。有人认为,剑桥是从牛津延伸出来的,其建筑风格必然参考牛津,并加以改进,当然更美。剑桥的王家学院教堂(King's College Chapel)建于中世纪,气势宏伟壮观,高大的石质弧形屋顶及其石雕艺术,玻璃窗户优美的艺术图案,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其风格可与英国著名的坎特伯雷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相媲美。

从建筑外表看,牛津和剑桥都十分古老,但从内部设备看,却十分现代,可谓古朴与摩登共生,传统与创新结合,田园风光与城市繁荣并存,金黄小城与红黑学袍(Town & Gown)共处。古老的塔楼传出的钟声,仿佛使你回到了中世纪,但古老建筑内部的设备却是非常先进的。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设备令人惊叹,出了许多人才和成果,其中有多位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大学科学区里,你可以看到工程科学、核物理学、生物学、物理学、优生学、冶金学、医学、化学等各个领域的先进设备。

图书馆

牛津和剑桥的大学图书馆是世界闻名的。两校图书馆都拥有极其丰富的图书资料,是世界学者的知识宝库。进入图书馆,犹如进入知识海洋。这里没有声响,也不许吃喝。牛津共有104个图书馆(学科、系62个,学院39个,大学总馆两个,市立1个)。最大的博德林(Bodleian)图书馆于1602年开放,比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早150年,现有藏书900多万册,拥有巨大的地下藏书库。该图书馆以其捐赠人Bodley爵士命名。当时的英国书业公所决定,此后英国出版的每一种书,都必须免费分别提供一册给牛津和剑桥的图书馆。剑桥也有近100个图书馆,藏书约700多万册,每年图书经费约300万英镑。

牛津和剑桥的图书馆,不仅藏书丰富,而且提供的服务富有特色:

(1)集中管理和自助服务相结合:牛津的总馆是“参考书图书馆”,全部图书不可外借,只可在其阅览室阅读,因此阅览室多而宽敞、舒适,有的书桌上还有电脑插座。开放时间长,上午9:00—晚上10:00,周末和假期的部分时间也不关门;剑桥有些图书馆每天24小时开放。读者只要从图书馆电脑网络查出书号、书名和作者,找书、取书、还书、复印等事务全由工作人员代劳,因而读者可充分利用时间,随时读到所需的任何书刊,思路不致中断,效率特别高。自助服务也甚有特色:各分馆全部开架、出借,读者自己找书、取书,填完借书卡,只需放在指定的地方,则可自行把书带出,虽有专人管理但似无人管理。我因是图书馆的“常客”,有的分馆还把钥匙交给我自己去开门。这里的读者高度自觉,具有学者风范,人人遵守规则,个个方便受益。

(2)资源共享:读者一卡在手,全校100多个图书馆和阅览室通行无阻。必要时,还可通过本校图书馆向其他图书馆借书(Inter-library Loan)。图书采编由专业委员会决定,确保其经费各科共享,并优先采购到最需要的书刊。牛津和剑桥丰富的图书资料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相

结合,形成世界上实力雄厚的图书宝库。由于总馆的藏书不可外借,这就保证图书不会丢失,还能方便所有读者随时可以读到所要的书。牛津流传着一个佳话:1645年国王查尔士一世要把书借出来,管理员不肯,他争辩说:“我是国王呀!”,管理员说:“国王也不行!”

(3)优质服务:通过联网电脑,可查找本馆任何书的详细资料,如书名、作者、书号、类别、藏书地点、内容提要等,也可查找世界上其他图书馆的详细信息。馆内到处都有电脑、复印机和打印机,管理人员也分布各处,可随时提供咨询和帮助。牛津和剑桥每周都有图书馆导游,向读者介绍图书馆并指导如何查阅图书。图书馆还印制各种图书目录和使用指南,供读者任取参考。我国高校的图书馆现在也有类似的服务,但牛津和剑桥早就有这种优质的服务了。

书店

牛津和剑桥的书店几乎与图书馆一样多,大小也有100多个。牛津有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性书店布莱克威尔(Blackwell)。它也是一家出版社,既出书又卖书,均世界闻名。这家百年老店创建于1897年,坐落在博德林图书馆的对面,附近还有牛津大学出版社,形成出书、卖书、藏书、读书一条龙,令人感到置身于书的海洋之中。从外表看,这家书店只有三个不大的店面,但进门后才知道三层楼和地下层连通,组成五层二围的书海,最顶层还有二手书店。书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令人目不暇接。要找有关书目,必须借助电脑和指示牌。这家书店在英国78家连锁店,在牛津也有10多家分店,分别经营各类学术书籍和艺术、小说、儿童、音乐等分类图书和音像资料,在其他国家也有许多分店。通过其世界网络,可以迅速查书、订书、调书、购书、托运,提供一流的世界性服务。1994年6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回母校参加荣誉院士的授予仪式,还特地到这家书店买书。剑桥的书店以黑弗斯(Heffers)和迪龙斯(Dillons)最为著名。两座大学城到处都有书摊,这大大增加了牛津和剑桥的学术气氛。

出版社

英国是出版王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最早的出版社。两大出版社出版的词典、百科全书、专著和教科书在世界上常被尊为经典。如20卷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是英语词典之王,此外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COD*)和《牛津现代英语高级学生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等都是英语学生日常要查的词典。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剑桥英语百科全书》(*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是英语学者所喜爱的。出版《圣经》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该出版社起源于15世纪末的技术革命,如印刷术的引进,1478年出版第一本书。分社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其中的美国分社(OUP, USA)比美国任何一家大学出版社都大。两家出版社都十分注重出书的质量,不允许用金钱去买其书号而出书。

博物馆

牛津和剑桥都有许多博物馆,牛津有8座,剑桥有7座,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牛津的亚士慕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建于1683年,是英国第一座博物馆,比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早70年,现为英国第二大博物馆。其他如大学博物馆、牛津博物馆、牛津故事博物馆、科学史博物馆、庇特河流人种史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对研究自然科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生物学、艺术、文化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小酒馆

牛津和剑桥的大学城没有夜总会,没有卡拉OK,更没有色情场所,但有遍布全城的小酒馆(pub)。这些小酒馆实际上是师生们交际的场所。小酒馆文化是英国文化的一大特色,牛津和剑桥尤甚。一到傍晚,学生们便汇集到小酒馆来,要一两杯啤酒、葡萄酒或一点小吃。百科学者,边喝边聊,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来者之意不在酒,而在于通过交谈,获取各种信息和知识,扩大视野,增强交际能力,避免孤僻、寡闻和书生气。许多好主意来自于小酒馆。据流传的故事称,当代人类重大发现之一DNA就是科学家在剑桥小酒馆的交谈中最终得到启发而发现的。DNA揭示了遗传信息,解开了生命奥秘,可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相媲美,因而荣获1962年医学与生理学诺贝尔奖。克林顿1968—1970年在牛津就读时常去的小酒馆Gardener's Arms于1992年11月曾挂出了一个字牌,上面写道:“热烈祝贺我们的前顾客、美利坚合众国新总统!”

学术文化传统

牛津和剑桥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给学者们提供了优越的环境,但人们从中所感受到的更是它们的文化传统。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在资本主义最为强盛的时期,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它屹然不动,没有受到市场、商品、利润、金钱的诱惑而改变其优良传统,而是一直保持世界一流的品位。到过这里的人,都会感受到学术文化的熏陶。它引人深思,令人发奋,逼人拼搏,催人进取。

大学经费

牛津大学的经费每年约2.9亿英镑,政府拨款不到30%,高昂的学费也才占12%左右,一半以上的经费要靠自己筹集,其中科研合同资金和外界捐款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要筹集如此大笔的资金,在大学如林的竞争中,靠的是能不能出成果、出人才。牛津和剑桥长期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位居世界一流,因而也容易地募集到大量的科研经费和捐赠。近年来英国政府削减对学校的拨款,牛津决定筹措“迈向21世纪发展基金”,消息传出后,得到许多大公司、大企业和海内外校友的热烈响应,二三年内就筹得捐款2.5亿英镑。牛津和剑桥的教师安心于教学与科研,不必为创收发愁。校外常有知名学者来参加求职竞争,争取受聘于牛津和剑桥,甚至愿意屈尊来当讲师,但也常常不能如愿。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优秀的教师和杰出的成就,又引来了不惜重金求知的高才生,也吸引了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形成了良性循环。此外,政府每年对大学的拨款要依据全国教育质量监督委员会的评估结果而定。两校的经费来源与其教育质量是密切相关的。

二、牛津和剑桥的杰出成就

世界名校的连锁传统

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最古老的大学。始于牛津的大学教育在西方英语国家间代代相传,产生了世界名校的“父→子→孙”关系:牛津→剑桥→哈佛→耶鲁。这与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

一样,有连锁和接力的传统。这故事得从头说起:

1168年,中国宋朝(960—1279)年间,牛津大学成立了,成了英语国家最早的大学。1209年,牛津一名学生因练习射箭,误杀了镇上一名妇女,引发了一场骚乱。部分师生受牵连,流落到了剑桥,其他一些学者也闻风而至,逐渐建起了剑桥大学。因此,剑桥大学可以说是从牛津大学分离出来的。

剑桥毕业生约翰·哈佛(John Harvard)于1636年从剑桥的伊曼纽学院毕业后,移民至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这个地方。1638年他临终遗言:把他的图书和一半遗产捐献给新镇,建立哈佛学院,仿照剑桥的伊曼纽学院,此后逐步发展成为哈佛大学,成了美国最早的大学。新镇地名也叫Cambridge,中文译为坎布里奇,以与英国的剑桥区分开来。

后来,哈佛大学毕业生来到现在耶鲁大学这个地方,与美国出生的英国商人埃利胡·耶鲁(Elihu Yale)合作,由耶鲁捐资,于1718年建立耶鲁学院,1887年重新命名为耶鲁大学。此后,耶鲁毕业生到美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学院,耶鲁成了“学院之母”(Mother of Colleges)。从历史的眼光看,美国高等院校大多继承了牛津和剑桥的传统,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名人与成就

牛津和剑桥建校800多年来,造就了无数的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其他各类专家。这些名人不仅遍布英国各大历史时期和世界许多国家,而且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大学术领域。从反面说,牛津和剑桥也输送了许多殖民主义者,为英国昔日称霸世界、成为“日不落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例如牛津毕业生帕默斯顿(Henry Palmerston, 1784—1865)担任英国首相期间(1855—1858, 1859—1865),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了中国。史学家在选编牛津和剑桥的名人时惊叹:名人太多了,以致“问题不在于要选编谁,而在于不要选编谁”。以下仅举一些为人所知的著名人物:从1721年至今,英国共有75位首相,其中出自牛津25位,出自剑桥13位,如:艾登、麦克米伦、霍姆、威尔逊、希思、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出自剑桥的小比特24岁就成了英国首相。许多出自牛津和剑桥的学者,后来成了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物,如:美国总统克林顿、印度总理尼赫鲁、英·甘地和拉·甘地、印度6位总督、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父女、加拿大总理皮尔逊、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挪威国王奥拉夫、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丹麦国王爱德华和女王玛格丽特等。牛津和剑桥获诺贝尔奖共有100多人,居世界大学首位。出自牛津和剑桥的哲学家如:洛克、培根、罗素等;文学家如:拜伦、罗斯金、华兹华斯、王尔德、弥尔顿、艾略特等。雪莱是著名的浪漫诗人,曾在牛津就读,1811年因散发小册子《无神论的必要性》被牛津大学开除,1822年在意大利海边游泳遇风暴而溺死,现在牛津有其塑像(Shelley Memorial)。人们还熟悉他那脍炙人口的《西风颂》里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家如:约翰逊、布拉德利、福勒、斯威特等。经济学家如:亚当·史密斯、凯恩斯等。

科学家的发明与创造

剑桥的科学发明和创造,大至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小至自行车。1860年,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在剑桥出现,那是学生出于需要而发明的。仅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就出了25人次诺贝尔奖。剑桥是“科学家的摇篮”。牛津也造就了许多科学家,其中最著名的如: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这个理论与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是19世纪的三大发现;波义尔,近代化学之父,其助手发明了显微镜;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奥秘;哈维发现血液

循环,使生理学真正成为科学;卢瑟福于20世纪30年代领导分裂原子研究;桑格验证了胰岛素的分子结构;爱因斯坦曾来牛津讲学,至今科学史博物馆仍有其用过的黑板,上面写着他的著名公式;麦克斯韦创立电磁场理论,其贡献可与牛顿和爱因斯坦相媲美;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

牛顿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在剑桥呆了35年。他总结了力学三大定律,证明了万有引力,发明了三棱镜和反射望远镜,创立了微积分,攻破了颜色之谜,还提出了冷却定律。1666年,牛顿回乡避黑热病,一天傍晚,他坐在苹果树下,忽然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他想,这个苹果为什么只掉在地上而不向天上飞,也不向前后左右掉?是不是地球在吸引它?这种引力是不是存在于整个宇宙?由此他开始思考天体行星的问题,逐步论证了万有引力。弗莱明出自牛津,他两次在实验室里获得了意外的重大发现:第一次是1922年,他患了感冒,无意中对着培养细菌的器皿打喷嚏,此时他注意到,凡是沾有喷嚏粘液的地方没有长细菌,他于是在体液和身体组织中找到了一种可溶解细菌的物质。这种他称之为“溶菌酶”的物质对人体细胞无害,能够消灭某些细菌,但对有害的细菌无能为力,这给了他某些启发。第二次是1928年,他外出休假的两个星期里,一只未经洗过的废弃培养皿中长出了一种神奇的霉菌,没有沾染这种霉菌的地方却覆盖着细菌,这一次是葡萄球菌。经证实,这种霉菌还能阻碍其他多种病毒性细菌的生长。他把这种霉菌称为 penicillin(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此后,这一发现经过剑桥校友、澳大利亚病理学家弗洛里和德国生物学家钱恩的努力,于1944年成为医用抗菌素。这是20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发现,可与原子弹和雷达并列为三大发明,因而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医学奖。

科学家的基本素质

哲学告诉我们,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偶然性的背后蕴藏着必然性并受其制约,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牛顿的万有引力和弗莱明的盘尼西林似乎都始于一些偶然发现的现象,但却蕴藏着必然性,那就是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对所从事的事业持之以恒、专心致志,对所研究的事物高度敏感、善于观察、满怀好奇、富于想象,对未经证实的理论持怀疑的态度。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现象习以为常,不以为然,可是牛顿却可以从苹果掉下来、弗莱明从打喷嚏和未经清洗的废弃器皿中引出改变世界的科学发现和发明。这就是牛津和剑桥所提倡的创造精神。

三、牛津和剑桥的优良传统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牛津和剑桥不仅在科研方面长期位居世界一流,而且在教学方面也十分出色。两校综合实力雄厚,学术资源丰富。造就的人才,获得的成果,享有的盛名,都是举世公认的。那么,其奥妙在哪里呢?为此,我请教了许多教授,查阅了不少资料,加上耳闻目睹,亲身体验,发现许多独特之处。

牛津和剑桥的办学思想是:“探测、挖掘和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激励个人的创造精神”(Detect, explore and develop students' potential, encourage individual initiative),注重综合素质,培养融会贯通、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在此办学精神的指导下,两校充分利用其优越的学术环境,采用神奇的导师制和独特的学院制,在变革和更新中坚持并发展卓越的传统,走

富有特色的办学之路。

神奇的导师制(Tutorial System)

全世界的导师制发源于牛津。这是牛津和剑桥办学的核心环节,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的主要方式,体现一对一“承包责任制”,有利于因材施教、精耕细作,有助于探测、挖掘和开发学生的潜力,关心、引导和鼓励学生的学业,从而促使学生独立钻研、开拓创新。

导师制以个人辅导为主,课堂教学为辅。牛津大学目前教师 1300 多人,学生 16000 多人(研究生约占 1/3),每位教师每周上课两学时,指导 6~12 个学生。每位导师每周分别辅导学生一次,每次每个学生 1 学时,有时可以 2~3 名学生为一组,同时辅导。辅导按课程表在导师办公室或宿舍里进行,边讨论边喝咖啡,气氛融洽,具体包括:学生汇报,导师评议,师生讨论,甚至辩论,导师指点,布置书目和论文,关心学生的思想和生活等。导师言传身教,德智并重,循循善诱。我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导师制:请我的合作导师把我当作博士生,体会确实不错。他不仅与我讨论问题,而且指导我去查哪些书、找哪些教授、听哪些课、到网络里查哪些资料,甚至带我去找其他教授、帮我办图书卡,买书送我、帮我安排住宿、圣诞节给我送贺卡,请我去参加大学各种学术活动,推荐我的专著到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如此等等,从学术研究到日常生活,可谓无微不至。我也调查了一些学生,他们都赞赏导师制,对导师充满了感激之情。学生由导师点燃了专业兴趣的火苗,从中得到学科知识、研究方法和精神熏陶,不知不觉成熟起来,因而终身难忘。这需要导师高度的责任心,平时的学术积累,也驱使大量阅读、独立思考并提出问题,反过来对导师的压力也很大。导师要比学生读得更多、更广,研究得更深、更透。如果辅导质量差,以后无人请你当导师,聘任就成问题。这是师生“劳力密集”(Labour Intensive)的教学方式,也是教师工作量的主要所在。

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所体现的是:

学生 — 自主性	学习者 → 创造者
导师 — 指导性	教导者 → 指导者
过程 — 研究性	接受知识 → 探求知识 ; 进知识 → 出知识
内容 — 前沿性	基础知识 → 前沿知识
目标 — 创造性	已知+新知,博学+创新

教师工作量

牛津大学不计算工作量,只在聘任合同里写明每学年每位教师上课 36 学时(每周 1.5 小时,每学期 8 周,每学年 3 学期,上课 24 周,假期 28 周),每位学生平均每周上课 8 学时,全年约 192 学时。教师辅导学生数由学科委员会根据教师专长和学生报名而商定。教授职称通过广告招引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聘任。教师工作量靠“君子协定”,因为知识传授主要靠职业道德、觉悟良知、雄心抱负、内外动力和师生合作,而不用时数、课数、人数等机械数量把师生捆死。课程设置由校方规定,学生可自由听课。牛津和剑桥有从不上课的教授(即只辅导和科研),也有从不听课的学生(即只接受辅导并独立钻研),但他们也会成功。

我们的本科生到了最后一学年才有论文导师,研究生导师制也不健全。工作量计算法引导教师注重教学时数、课数、人数,多开课、开大课、开长课才能填满教师的工作量,但同时也把学生的课程表排满(难怪教室不够用)。这样一来,教师能有多少时间个人辅导,学生能有多少

时间独立钻研?

牛津和剑桥的学期周数少(一学年才24周,扣除节假日,仅150天),假期时间长(共28周),但每学期的教学活动效率高,师生员工都全心投入,容不得偷懒;而假期虽长,师生除了旅游玩乐之外,也抓紧著书立说。

传统教育法比较

我们的传统教育法把课堂教学当作主要环节,中小学如此,大学也如此;过去长期如此,现在也如此。不少教师满堂填灌,照本宣科,不讲效果,自我感觉良好,殊不知学生已快罢课了。牛津和剑桥的教师宁可精讲多议,画龙点睛,启发引导,把参考书介绍给学生去阅读,也不搞照本宣科、讲义保密,更不愿意在漫长的课时内重复那些课本上已有的、学生也听厌的内容。

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是世界闻名的,也是独特的。我们由于种种原因还难以完全照搬其做法,但适当减少课堂教学时数,把腾出来的工作量用于个人辅导,也让师生有足够的时间去钻研,并用措施保证其执行,修改工作量计算法,看来是可取的。

导师制更符合西方文化的特点:个体主义价值观。西方的个体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和个人的努力,注重自我激发和自我进取,提倡自立精神和创造精神。导师制能针对个人的特点,培养个人的能力,引导个人的进取,促进个人的创造。这个原理与英美病人要找相对固定的医师看病是相似的。英美这类强调个体本位的价值观也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体现。学校的教学方式,牛津和剑桥以个人辅导为主,学生如吃小灶;中国的大学以大班上课为主,学生如吃大锅饭。牛津和剑桥设置许多课程让学生选修,学生如吃自助餐,参照导师的指点,根据自己的需要选修课程,构成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国的大学规定许多必修课,学生如吃“道菜”,按照预定的“菜单”,一道一道“上桌”,人人吃的都一样,不吃也得坐在那里。这也反映了英美文化的“个体主义”精神和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精神,前者较易培养学生的个人能力,后者较易发展学生的“共性”而忽视学生的“个性”。导师制教学如精耕细作,导师如同园丁,细心照料每一棵树苗,师生关系是“承包责任制”。导师可以因人而异进行因材施教,既教书又教人。导师制便于启发、引导、讨论、争辩,促使学生独立思考、开拓创新。大班制如粗放农作,教师虽是园丁但无法顾及每一棵树苗。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容易引导学生按照统一的模式去思考,压抑个人的创见,促使学生“人云亦云”,难以开发个人的潜力。

导师制对师生的要求

导师制对学生来说,要大量阅读,养成博览群书、快速阅读的好习惯;要经常写作,写论文、读书报告和实验报告;要独立思考,准备问题与导师讨论;要富有创见,让导师了解、满意。导师制对教师来说,要有过得硬的学术水平和业务素质,才能经得起学生的提问;要比学生读得更多、更广,钻研得更深、更透,才能引导学生去开拓、创新;要制定学生的学习计划、设置选修科目、指定阅读书目、布置撰写论文、检查学习成果。导师不仅要传授知识给学生,而且要指导学习和研究的方法,例如指导学生如何去查找有关的知识。牛津的语言学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过:知识有两类:一是你已懂得并记得住的知识,二是你虽记不住但懂得何处去查找的知识。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但你如果懂得在哪里有你要的知识,并能准确地查找出来,那么,这些知识也可以算是你的,因为当你要用这些知识时,你可以马上查到,而别人却未必能够找到。牛津和剑桥都重视并强调学生充分利用大学、学院、科系的各种图书资料和网络信息。

开课计划与形式

牛津和剑桥的开课计划由学科教师团、系和学院制定,每学科均印发课程表,由校方公布,放在大学中心,提供“菜谱”十分丰富的“自助餐”,让所有学生选修。每门课程按教师实际水平和教学需要开设,可长可短,学年、学期、几周均可,有“料”则长,少“料”则短,无“料”不开,不把可缩短的课程拉长去填补教师的工作量和学生的学分,不增加学生的负担。上课学生数不限,可少至一二人。每周每学科都有各种讲座,由本科、本校、外校或外国的专家学者开设。上课和讲座一律自由参加,不点名也不限制。我们还有个自觉的问题,必须用点名来加以约束。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与“自助餐”相结合,使学生更易发挥个人的能动性。

独特的学院制(College System)

牛津和剑桥的学院与我们通常所指的学院不同:它不是以学科来划分的,而是一个“五脏俱全”的自治团体(Self-contained, Self-governing Community),如同大学的缩影。800多年前,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创建之初,就是由独立的学院联合而成的,至今仍保持着这一传统。牛津现有39个学院,剑桥有31个学院。每个学院由300~500个师生组成一个集体,从事不同学科的教学与科研,文理工科基本齐全。院士由能当导师的高级教师组成,院长由院士中选举产生,组成一个学术民主的领导班子。院士既是导师也是教师,有的还兼任行政管理职务。教授一般面向全校教学,也有的院士只搞科研而不教学的。学院聘任不同学科的教师,招收文理工科各类学生,组成大学的生活集体。每个师生既是大学的一员,也必须是学院的一员。学院负责招收本科生,聘任教师,指派导师,发放工资、奖学金,提供师生学习和生活设施,如宿舍、食堂、图书馆、电脑室、医疗室、体育场及活动场所,为师生创造自学条件和交流环境:师生各有单人宿舍,又同吃、同住在学院里。学院让师生既有小集体生活的好处,又分享大学的庞大资源。大学所体现的是学科的教学研究与学院的集体生活相结合。学院与大学既是一体,又有分工。学院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承包制”,每个师生都由一个小团体负责关心照料,学院是师生的“家”。

牛津和剑桥的学院还具有如下特色:

1. 实施导师制

大学的导师制由学院来执行。学院负责本科生的招生入学和导师指派,并组织本科教学。每个本科生入学后,由学院指派一位导师,视需要还可再选派1—2位课程导师,由导师指导该生选修科目,每周在指定的时间内接受导师辅导一次。研究生由学科教师团或系负责招生入学、指派导师和组织教学科研活动,但仍生活在学院的团体里,由学院指派指导员负责生活管理。换言之,大学通过学院来管理所有师生,组织本科生的教学和科研,并通过学科团和学科系来组织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大学一级的机构则负责批准入学、管理学籍、设计课程、组织考试、颁发学位、聘任教授、统筹全校的资源 and 财源及其预算、分配和共享等总体管理。

2. 便于跨学科交流

各门学科和不同背景的师生混合生活在学院里,同吃、同住、同活动,有机会与著名学者接触,朝夕相处,互相研讨,扩大视野,活跃思想,便于跨学科交流,有利文理交融,促进全面发展,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从而提高师生的综合素质。为了便于跨学科交流,牛津和剑桥精心设计了一种按楼栋安排师生宿舍的制度:四方院有许多楼栋,每楼栋有2~3层,每层有2~

3套房,共4~9套房,按不同学科、年段、民族、背景等混合安排,以利互相交流。牛津和剑桥的教育传统实际上早已体现现代教育观念,注重跨学科交流和研究,难怪培养出众多世界一流人才。

3.密切师生关系

大学规定,每个学生至少在学院住两年,新生一律住学院,常年保持2/3学生住在学院。有的学院规定所有的学生都住在学院里。许多教师的家在校外,但在学院里有其宿舍和办公室,便于学生求教。学院餐厅高雅、整洁。院士和贵宾在高桌(high table)就餐,体现尊师敬老精神。师生整齐地坐在同一个餐厅里,边吃边聊,形成团体生活气氛,便于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和师生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此外,学院有各种学生团体,组织体育或其他活动,活跃学院的生活。

4.引入竞争机制

学院办学质量直接与经济效益和名誉地位挂钩。学院自负盈亏,有各自的财源、财权和财产。经费除了大学拨款之外,还靠学费收入和校外捐款。这就要求学院必须办好,有吸引力,才有生源,才有名师应聘,也才有外界和校友捐赠,从而形成学院之间的竞争。此外,大学之间还有校际竞争,如牛津和剑桥,每年都互相派人主考。各学院毕业考试成绩,每年公布名次。全国有教育质量监督委员会,学校排名和政府拨款根据其评估质量而定。

学科教师团(Faculty)

学院不按学科划分,那么,谁来管理某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这就产生了跨学院的学科教师团。牛津共有16个学科教师团,剑桥有20个,每个教师团有管委会,下设系、研究所、研究中心等,负责某门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一般有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等,每个教师既属于某个学院,又属于某个学科,具有双重身份,双重职能。学科教师团的职能是:实施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制定课程设置,编印课程表,主管学科考试、学术讲座、论文答辩、学位评定、研究生的招生、教学和科研等学术方面的事务。牛津和剑桥的体制是:在校一级的宏观管理之下,学院是纵向的,学科教师团则是横向的。

招生和考试

除了导师制和学院制这些富有特色的办学方式之外,牛津和剑桥在招生和考试方面也有独到之处。考生除了参加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考试之外,还要经过中学推荐,大学笔试和面试,提交论文,大学甚至派人家访,充分了解考生的素质、动力和智力,经过综合考核,选拔尖子,而不是靠几份考卷和分数录取新生。大学对本科生的正式考试只有两次:第一年后考一次,决定专业方向;第三年毕业考,几天的笔试和口试,加上论文答辩,决定学位。平时也有学科考试,但主要是写论文。校方严格执行大学互考制度。

传统加革新

牛津和剑桥除了长期保持其优良的传统之外,也在不断改革创新。传统加革新使其保持世界一流的地位。这些革新还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1.基础学科的比重增加

通常,我们认为中学学习基础知识,高校学习专业知识。牛津和剑桥的本科第一阶段仍是基础教育,第二阶段才是专业教育。

2. 文理工科互相渗透

全校所有课程向所有学生开放,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跨学科选修。

3. 课程的综合化

课程的综合化主要是打破科、系界限,实行新的学科组合,如设立综合性的欧洲研究、亚洲研究、美国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研究、教育研究等等。

4. 大量开设选修课

基础教育阶段必修课多些,专业教育阶段选修课大大增加。

牛津和剑桥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牛文化”

牛津和剑桥创世界一流的精神,来自于牛津和剑桥的教育传统,我把它概括为“牛文化”。鲁迅写道,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牛津和剑桥吃的不是草,而是知识,很多的知识,不断吸收,不断消化;挤出来的不是牛奶,而是人才、成果、发明、创造,自己也长得体壮如牛,而且800多年永葆生机活力。

走进牛津和剑桥,你会时时处处感受到浓厚的学术气氛,人人一心追求学问、追求知识、追求成果,比贡献、比发明、比创造,蔚然成风,师生员工人人讲究高效率、高水平、高质量。在牛津和剑桥的大学城里,人人为一个字忙碌:“书”(理工科还要做实验)。写书(著名学者云集)——出书(有世界一流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卖书(牛津和剑桥各有100多家书店,包括世界一流的Blackwell)——藏书(牛津和剑桥各有100多个图书馆,包括世界一流的Bodleian)——读书(师生博览群书成风)——教书(辅导+上课+讲座),真是书的世界。

做学问的十大环节

在做学问的十大环节(听、说、议、读、写、译、记、做、用、创)中,牛津和剑桥都十分注重“议”、“读”、“做”、“写”、“创”(学外文要“听、说、读、写、译”五会,还要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其中以“写”来带动其他环节,并体现成绩和成果。从入学、考试、毕业,获得学位、职称,直至成为专家学者,都离不开有创见的论文或著作。“写”这一环节,除了上课启发之外,主要靠大量阅读和导师辅导(包括讨论、评审)来促进。“议”,处处可见,导师制就是师生之间的“议”,课堂教学也常常是师生之间的“议”,学生之间也常常在小酒馆“议”。“做”就是要勤做实验,要善于观察,富于敏感、好奇和想象。这五字中,“读”是基础,“做”是手段,“写”是中心,“创”是目的,而“议”就是启动器。

我们的传统教育注重“听”、“读”和“记”,以迎接“考”。教师满堂填灌,学生紧抱课本,死记硬背、被动应考,无暇博览群书、独立钻研,更难产生创见、创新。这一套在中小学还马虎可以,但到大学就落后了。其实我们的这一套教育只达到做学问的第一大阶段:吸收前人或别人的知识,基本上未进入第二大阶段:发现未知的知识或创造新的知识,即只管“进”知识而不管“出”知识。即使在吸收知识阶段,我们的学生也大多忙于上课,围绕教师和课本转。

牛津和剑桥的上课时数少,只起启发和引导作用,大部分时间要靠学生自己去钻研。如今,知识爆炸,除了大量的书刊资料需要阅读外,电脑联网后,全世界的知识资源已开始共享,都需要时间去查阅。牛津和剑桥注重个人见解,教师重启迪,学生重质疑。学习不靠死记硬背,而靠积极的智力活动。我们的学生善于“模仿+记忆,复制+粘贴”。如今我们的学生(尤其本科生)写毕业论文十分艰难,到了毕业前,人人忙于找职业,抄袭移植、七拼八凑来应付论

文,几乎成风。论文都难产,我们何时才能有世界一流的发明和创造?我们的科技跟不上人家,长期以来连语言学都没有自己的理论和学派,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有了“中国文化语言学”。写有创见的论文是我们的弱项,也是与一流大学的重要差距。

启发式教学

牛津和剑桥废除标准答案,提倡独立思考,激励发明创造。其教育体制训练学生去寻找并吸收知识,形成并维护自己的观点。英文 educate (教育) 一词的含义是“develop mentally, morally, or aesthetically”,注重诱发人的潜力。重诱发必然重讨论,引导学生充分抒发己见,多提问题,鼓励学生难倒教师,甚至超过教师。

牛津和剑桥都十分重视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讨论,鼓励“群言堂”。中国的教育传统重视标准答案,注重“传道”、“授业”、“解惑”。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听课、阅读、理解、积累、记忆、模仿,鼓励主动性和创造性往往只停留在理论上,在教学活动中常被忽视,或因大班制而难以实施。中国的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侃侃而谈,学生埋头做笔记,很少提出问题,课堂变成了“听写课”和“一言堂”,学生往往是“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完全忘记”。我的妻子是小学校长,那年暑假去英美探亲时,特地考察了英美的中小学,我便当她的翻译。有一次我们去听课,发现那里的中小学也重视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讨论。小学生分成小组围绕几张方桌坐着,教师善于启发学生提出问题,展开讨论。中国来的插班学生乖乖地坐着听讲,不如英美学生活跃,也不善于提出问题,被人看作“呆子”。教师请他到讲台,问他能表演些什么。他把“九九乘法表”背念得滚瓜烂熟,一时轰动了全班,被老师看作“神童”。此后,我们到了美国访问,听了初中一年级的课。老师问学生:“树上有10只鸟,用枪打死1只,还剩下几只?”,如果我们的学生回答,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剩下的鸟都吓跑了。”可是美国的学生却提出了许多问题,如:“那枪是有声手枪还是无声手枪?”,“10只鸟是在一棵树上还是在几棵树上?”,“10只鸟中有没有耳聋的?”,“有没有鸟待在鸟笼里而吊在树上的?”学生善于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各种可能的问题,而不只是用一种答案回答问题。

以上例子说明我们的学生从小就不习惯提问题,而善于死记硬背,到了大学,还是如此。不会提问题,就是不会发现问题,那要如何解决问题?爱因斯坦说过,善于提出一个好的问题,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牛津和剑桥的教师如果在课堂上无法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师生就会觉得这堂课失败。即使是以“一言堂”为主的课,教师也会留下一些时间,让学生提问。学生的成绩要参考平时该生在课堂讨论的表现而定。牛津和剑桥采用的是“启发式”教学,中国学校采用的是“注入式”教学。

此外,英美人富于幽默、诙谐,讲课重形象、重生动、重“表演”、重“戏剧性”,以吸引学生的兴趣,这样,选修课这桌“自助餐”才有人问津;中国人较缺乏幽默感,讲课重一本正经、重师道尊严、重循规蹈矩,缺乏灵活性、生动性和形象性,缺少吸引力,往往靠点名来强制学生上课,因而必修课多而选修课就少了。

牛津和剑桥注重开发学生的个人潜力,激发学生的个人才能。“自助餐”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多样,学习灵活,思想活跃,业余爱好多。学生走上社会后,可以不断“跳槽”(Job-hopping),适应能力强,是一专多能或多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中国的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共性而忽视学生的个性,“道菜”多而“自助餐”少,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学生主动性少,被动性多,虽刻苦用功但不善于活学活用,毕业后较难适应社会的各种需要,往往要再学习“第二专业”或“第三专业”才能胜任工作。